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思想的谱系

西方思潮左与右

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

〔英〕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 著
袁银传 曹荣湘 等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思想的谱系

西方思想源流与走向

SPECTRUM

WESTERN THOUGHT SOURCE
AND TENDENCY OF TENDENCY

中国大学出版集团
中国石化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CUP
地址：北京263809
电话：010-64739298
E-mail: cnp@cup.cn
http://www.cup.cn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英]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 著

袁银传 曹荣湘 等 / 译

思想的谱系

西方思潮左与右

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谱系: 西方思潮左与右 / (英) 安德森 (Anderson, P) 著;
袁银传等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 - 7 - 5097 - 3885 - 6

I ①思·· II ①安·· ②袁…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西方
国家 - 现代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021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思想的谱系

——西方思潮左与右

著 者 / [英] 佩里·安德森

译 者 / 袁银传 曹荣湘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 惠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9.75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2 版

字 数 / 45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885 - 6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07 - 4907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 and 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献 给

挚友汤姆·莫提斯 (Tom Mertes)

致 谢

本书所载文章的部分或全部最初均发表于《伦敦书评》：《顽固的右翼》，1992年9月24日；《宪政舞台》，1992年10月22日；《中欧之梦》，1999年11月25日；《纪念》，1993年10月21日；《英国内战，全球瘟疫》，1993年11月4日；《杰出的语言学家》，2001年5月10日；《被征服的左翼》，2002年3月17日和10月3日；《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在中国》，1998年7月30日和8月20日。《设计共识》，则首次发表于《异议》（*Dissent*），1994年冬季号。《谋求价值》和《武器与权利》，发表于《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1998年9~10月号第1/231卷，以及2005年1~2月号第32卷。《热带回忆》和《家庭图谱》首次出现于《民族》（*The Nation*），2004年1月26日和2005年5月30日。本书第四部第一篇文章原以《读者点评》（*Reader's Note*）的题目载于《伦敦书评文选》（*London Review of Books: An Anthology*, London 1996）。这些文章大多数都经过了修改和加工。“规范事实”至今未公开发表过。“又及”的增补文章写作日期已在文后注明。

我特别要感谢《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Mary-Kay Wilmers）和苏珊·瓦特金（Susan Watkins），以及我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们给本书的部分内容提供了修改建议。同时，我也要感谢汤姆·莫提斯、乔孙恩（Choi Sung-eun，音译）、张晓红（Zhang Xiaohong，音译），他们在此书出版的准备阶段给我提供了帮助。

前 言

本书是一部有关当代思潮史的著作。可以把它看做一份对于特殊知识景观的全景指南。本书所关注的这些思想家和作家们，分属于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虽然一直以来这些派别之间的定位和边界比较模糊，但他们显然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这正是标题所提及的谱系。这种概念和信念的全音阶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要从低到高把所有的音阶唱上一遍，换句话说，把整个谱系透彻分析一遍，则相当不易。这里有两个站得住脚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每一个政治派别自然而然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同类而非敌手。爱争辩的热情可能给对方、给所有的旁观者留下纯粹恶意的固定印象。冷战期间便充斥着这样的作品，它们很快便被人忘记，犹如其工具性作用一样。但是从一个更为严谨的学术层面来说，思想的派别往往以支持态度为基础，以同类相吸的学术视野为基础。最重要的是，研究某人为什么会如此坚持己见，这样的冲动不仅是十分适当的，而且会富有收获。然而它显然也会限制你的视野。观念是没有什么绝对价值的：它们的价值总是和其他观念在这个领域所起的作用相关，有关其他观念的知识也提供了评价它们的价值的标准。故步自封是绝不会带来这些的。

相对来说研究不多的第二个原因和政治领域的特性有关。政治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行为，不能够自行孕育出一个内部的概念体系。与某一时期一系列被视为政治冲突有关的观念的东西，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时至今日，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科学的范围。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更不要说地理学、生命科学和艺术，在经典定义中都与政治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相交

点。正式的政治理论虽然远远谈不上消失，但它也只占据一部分领地。然而，这是一种扩张，一种臣服于专业化铁律的扩张。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门孜孜追求政治前景的学科所跨的范围越宽，它找到一种有关创造了时代的权力和社会——恰当地说，也就是政治领域——的观念范围的适度感觉的难度则越大。在对整个领域进行有限探索方面，专业的局限更加重了派别的色彩。

然而，在尝试步入这个领域时，我还是遵循了《交锋地带》（*A Zone of Engagement*）所采用的方法——这是一部我之前写的著作，眼前这本书可以视为它的续篇。不需要在这里对其做详细的叙述。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已预设了这一前提，即任何复杂的观念都已在制造这些观念的特定作者的详尽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这些作品是无法脱离，但也不可还原为，总属于社会性或概念性的历史语境的。换句话说，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既不把它们当做无时间的主题，也不把它们当做通行的话语，更不把它们当做专业化的措辞，这三者都是最常见的权宜之计。而另一方面，本书也不是前一部著作的一个简单的附录，因为它的构思中包含了范围的变更。在前一部著作中，我解释说由于我谈论一部著作的最初动机往往是批判性的赞赏，因此我发现，去写那些我私下感觉太近的作者实在不是件易事。在构思一本全方位论及极右、中立和极左的思想家的著作时，我也曾力图克服这种局限性。《交锋地带》提及了三位左翼的思想家，这几位曾是我那时想写却感到力不从心的人。三位中的两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是本书独具的内容；而另一位，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是另一部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中的焦点人物。这是某一谱系终端的一次扩展。此外，我在这里还考察了另一群思想家。和前面考察的所有人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多多少少带点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在《交锋地带》中的主要角色无疑就是这样的——而是顽固的右翼理论家，是任何一种自由主义共识的敌人。

如此的结果，便是眼前这本在概念上比以前的著作更具系统性的著作。因个人兴趣使然，从政治领域的任何一个流派中挑选任何一个人物，总是会

有武断之嫌。对本书所涵盖的人物进行分析，无论如何都不能预先设好套路，而只能随机应变。但是，对指引着后面那些选择的底部结构进行考察的意图是早就形成的。作为全书红线的政治谱系，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的话题范围。左、中、右三派对同样的主题或学科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政治思想的经典传奇人物，从柏拉图直到尼采，以及领导这个世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当前任务，早已经成为右翼最为关心的话题。标准化的哲学建构已经成为中间派的专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探索——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眼前的——则主导着左翼的产出。任何企图想一把抓住这三派观点的人，均如同强行横穿崎岖之地。在本书中，读者遇到的话题将涉及各种各样的理论，如法学、国家理论、经济学、家庭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古代和 20 世纪的教训的理论、关于记忆和死亡的理论等。很明显，这些理论都已被各自领域的专家所驾驭。但是，在它们作为舆论特殊阵地的独特资源进入政治文化的总仓库时，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的，哪怕因此而有失片面。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打算，不是以什么博学的能力为底气，而只不过出于当一名编辑的改不了的习气。我如今在一家综合性期刊连续工作已 50 年，期刊工作让我不得不读很多东西——至少是泛泛而读吧——也因技术需要而不得不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①。当然，其中的局限性就用不着多提了。

用不着自吹自擂说，本书通过一把特殊的棱镜所透视过的话题，已是十分之全面的。其中一些知识体系的缺口我已在其他地方弥补过：关于显赫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及其最活跃的政治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我曾在《后现代主义起源》中讨论过。其他领域的人物也已经被我那些亲密的同仁分析得很到位，多说已多余。其中包括两位风格迥异的、当今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菲利浦·鲍比特（Philip Bobbitt）。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及其学派的世界体系理论尽管还必须接受这种检验，但它已引起

^① 《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创刊于 1960 年。我开始参与其编辑工作是在 1962 年。当然，这层关系也界定了我在政治谱系当中的位置。

人们的广泛讨论^①。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文化政策理论，其影响今日一点也不小。其他缺陷则更多与这一事实有关，即足以代表相关领域的明确观点的、处于关键位置的人物和作品并不多。这也完全是那些构成了新世纪绝大部分政治议程的紧迫问题所面临的情形，尽管写出与之同等重要的作品是必须的。生态学和生物技术就是明显的例子。女权主义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它如今的相当重要的历史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令人迷惑的学术止步和前进的图景。如果当前属于一种相对的间歇期——看不到《第二性》（*Second Sex*）这样的作品——那它就很可能继续走下去。与政治职业相比，政治的观念世界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男人的事业，尽管迟早一方会赶上另一方的。

本书的展开遵循了时间的顺序。从冷战结束，也就是《交锋地带》出版之时，右翼的观点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中间派逐渐迎合他们，从全球来看，左翼则仍然处于大撤退之中。已经开始的学术回归的浪潮——从其历史涉及面严肃地看来，“新自由主义”一词捕捉到了其中某些东西——习惯性地从各个方面对左翼形成了压力。失败对于强人来说是一种艰难的体验：抵住诱惑，方显英雄本色。然而，一旦抵住诱惑，此时就有必要拥有一种直面理论对手的能力，既不自我陶醉，也不自我欺骗。这就需要一种求索和批判的文化，它不满足于只是依偎在左翼本身的传统怀抱里，在这种传统中，政治学对待自我专注的一般态度总是会受到少数派阵营围攻的精神强化，正如左翼学术圈一直就是的那样（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尽管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有过短暂的例外），其程度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抵制这种退步。

本书第一部分考察了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属于右翼文献的主要作品。主宰这一领域的有四位思想家，每位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杰出的天赋。本书开篇将讨论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① Peter Gowan, "A Calculus of Power", *New Left Review* 16, July - August 2002, pp 47 - 67, Gopal Balakrishnan, "Algorithms of War", *New Left Review* 23, September - October 2003, pp 5 - 33

Hayek)。自从本书写成以来，后续有关这四位思想家（他们就像是单独一位思想家似的）的文献已成百花争艳之势^①。然而，正是这些因应大众民主浪潮的思想之间复杂的内部关系，才是理解它们的政治影响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本书分析他们那一章的主题。本部分的其余两章关注了另两位属于同一阵营的学者，他们在英国的公众生活中十分著名，并都解释了民主何以被认为从那时起就在走下坡路：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他用奥克肖特的传奇来影响英国国家和社会的内部结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他关注的是西方模式的外部复制，而这种西方模式是解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以及外部世界奏响四重奏的危机的模式。本部分的标题“政治学”，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也就是说，用来管理一个国家的组织和政策的设计，以区别于广义层面上的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属性和结构，或者用法语说的与 *le politique* 相反的 *la politique*。很自然，写到这个领域，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右翼阵营，因为世界在这个时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本书第二部分考察了世纪之交的三位领军性政治哲学家，他们被广泛地尊称为——且自我标榜为——温和左翼的人物：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用不着做任何特殊的强调说明，本书把他们当成了这样的思想家：无论如何，最好把他们视为这个时代的中间派人物。之所以这样对待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理由来自那个把他们后期著作中的国内政治理论串联起来的概念：共识（consensus）。如果连这个都不算中间派的价值精髓，就很难说还有什么会是了。博比奥，这位拥有一段更长久且更投入的左翼言论记录的思想家，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归为这一派的：事实上，他曾经言辞凿凿地说过要在左翼与右翼之间重新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而只留给中间派一片出逃的空间。

① 对此类文献最杰出的贡献是 Gopal Balakrishnan, *The Enemy.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 London 2000; Paul Franco, *Michael Oakeshott*, Yale 2004, and Daniel Tanguay, *Leo Strauss; un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2003。这些著作都十分有趣。此外还有 Ala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New York 2001; Hans Jorg,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Die Tradition der Freiheit*, Dusseldorf 2000。它们比较公正，但起步难免有局限。

就他而言，政治分类是一种历史接合功能，而不是一种基本标志功能，这点甚至比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更清楚。当哈贝马斯和博比奥毫不含糊是左翼的时候，我就在早期的作品中写到过他们^①。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三位思想家的国内政治理论（就像下文所要分析的那样），那么博比奥在情感上始终比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更为激进。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三位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述（这也是本书中间部分的主题），那么，他们对于那种曾经为成功的帝国战争张目的军事干预原则的一致认同，无疑就把他们三位定格在当今的传统知识的中心位置。

本书第三部分转移到了左翼的领域。在那里，所有我们评述过的人物都可以被视为与作为过去的记录的、区别于任何道义论的历史学之间有着比本书考察过的任何右翼或中间派人物更加明确的关系。当然，这么说并不牵扯到那些相当著名的现代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但它又确实牵扯到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这位抱持19世纪观念的历史学家，古典派的语文学家，以及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这位从职业上看是社会学家，但主要作品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都属于重大的历史综合的思想家，还牵扯到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这位风格独特的、在自己的小说中从未把当代世界当成对象的思想家。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运动的现实生活如今已远离他们，难道这已是左翼的普遍倾向吗？结论很简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未曾停止参与当代政治。这种历史胸怀所表明的东西，相当程度上与直到最近还是国际左翼“主流文化”（*Leitkultur*）的东西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毕竟，它的建立者还是把它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不言自明的是，能够拿出像瑟伯恩、布伦纳或是霍布斯鲍姆等人的极为

① 关于哈贝马斯，可参看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82, pp 57-67,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1992, pp 327-331;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1998, pp 36-44。关于博比奥，可参看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1992, pp 87-129。博比奥既对上书做了回应，也对本书有关他的论述做了回应。关于我和这三位之间的意见交换，可参看 *Teoria Politica*, Nos 2-3, 1989, pp 293-308; *New Left Review* 1/231, pp 82-93。

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现代家庭的历史、全球经济动态以及 20 世纪分期等世界范围的主题），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太可能被宣告死亡的。我对于左翼人物的评价有时会因我被请求或自己想要写他们的时机不同而不同。其中两篇是关于爱德华·汤普森和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两人的主题之死的，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其他两篇只论述了某位作者的单独一篇作品，一篇是关于戈兰·瑟伯恩的，另一篇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后者作为当今世界最受尊崇的小说家，关于他的评论被收入本书，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怪异——有哪部左翼的文集能够把他撇开？最后两篇文章用更长的篇幅考察了这两人的主题，每篇都有两个要点：一位是罗伯特·布伦纳，关注的是他有关英国内战和长期萧条（the Long Downturn）的著作，另一位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关注的是他有关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世界的四部曲以及他自己的回忆录。最后一篇文章为了与它的作者本人写作《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的方式保持一致，也与这一时期的现实保持一致，被冠以“被征服的左翼”的标题。但是，被打败和被征服是不同的。这些作者当中没有一个人面对胜利者低下自己的头颅。如果要在谁变成了中间派、谁仍然是左翼之间画一条界线，那就在这里了。

作为一种体裁，论述别人的文章经常会暗中提出论述者本人的观点。文化研究使“自我定位”风行一时，似乎万事开头总要有个定位。在这里，我愿意简单地指出我作为作者所欠的两份人情：第一个是欠《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在那里首次发表的。我有着长期的政治背景，离纸上的普通生活很远，就是在它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按照一种对我来说十分新颖的方式去写作以及去思考。我对《伦敦书评》所做的描述，总是力图抓住该刊的独特魅力，并且可以被解读为把我自己的文章归功于它的教益。期刊评论很难写，而且关于它们的作品也很少。随后的批判性兼赞赏性的评论是从期刊投稿人的立场写的。本书以我父亲在中国的生活记录作为结束。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代人亏欠另一代人的东西总是很多。我所描述的环境使得我从过去脱离出来，但是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尽管有些迟），我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认识到了有些东西已深入我的灵魂。但是，关于一个人、一个机构的故事，本身都代表着一段历史。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汪 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